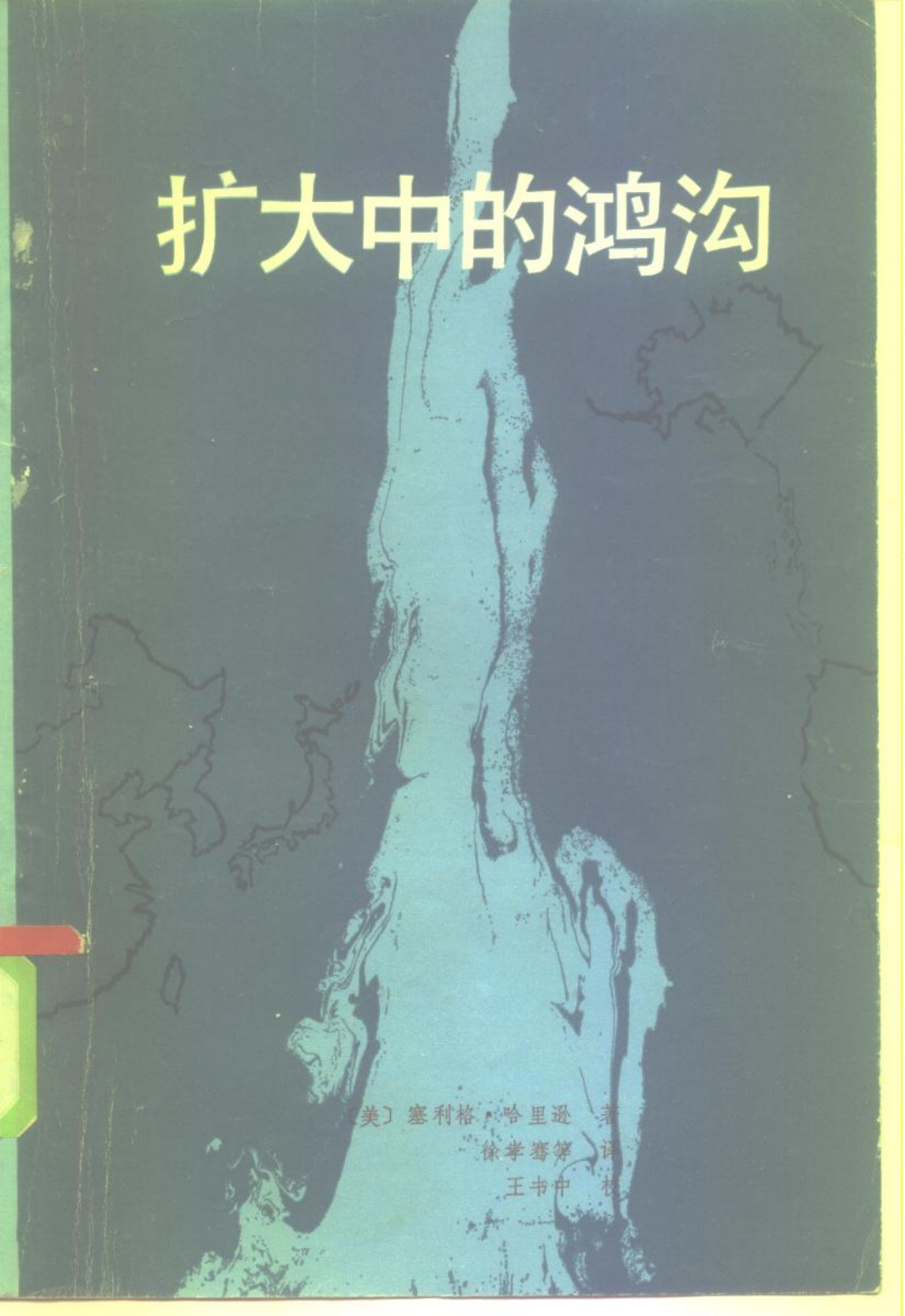


扩大中的鸿沟



【美】塞利格·哈里逊 著

徐孝骞等 译

王书中 校

464597



扩大中的鸿沟

亚洲民族主义和美国政策

〔美〕塞利格·哈里逊 著

徐孝骞等 译

王书 中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责任编辑：范道丰
责任校对：王桂琴
封面设计：王彦萍
版面设计：钱 锋

扩 大 中 的 鸿 沟
kuo da zhong de hong gou

亚洲民族主义和美国政策

ya zhou min zu zhu yi he mei guo zheng ce

(美) 塞利格·哈里逊 著

徐 孝 葵 等 译

王 书 中 校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7.625 印张 2 插页 186 千字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00 册

统一书号：3190·050 定价：1.35 元

Selig S. Harrison

The Widening Gulf

Asian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Free press, 1978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根据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纽约分公司

自由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译者的话

塞利格·哈里逊先生原著英文版《扩大中的鸿沟：亚洲民族主义和美国政策》（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一书共十二章，现选择其中有关中国以及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问题的六章译出，共约20万字。

塞利格·哈里逊先生长期从事亚洲问题研究，曾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檀香山东西方中心负责亚洲问题研究的高级研究员。本书就是在布鲁金斯学会和东西方中心支持下撰写的。由于他曾在亚洲地区长期工作，使他掌握了较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比较了解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认识到美国战后的亚洲政策因未能考虑亚洲民族主义的现实而不断受挫，并认为这是美国今后在亚洲的存在所必须引以为戒的。鉴于当前美苏两国对亚洲的争夺日趋激烈，而中美关系又是国际上广为关注的问题，我们相信，塞利格·哈里逊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我国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同志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由徐孝騫、金婉如、王宝玉、瞿林、李振洁、陈康、张辉、万青合译，王书中统校。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指正。塞利格·哈里逊先生热情地希望加强中美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专门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特此说明。

目 录

中译本序言	1
第一章 民族主义和毛主义	6
第二章 民族主义和美国的军事存在	25
第三章 民族主义和美国的经济存在	93
第四章 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政策前景	145
第五章 美国在亚洲的经济政策前景	180
第六章 区域主义的意义	205

中译本序言

塞利格·哈里逊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难以理解“一个中国”的概念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在越南战争期间对南北越都想建立一个统一的越南这个愿望反应迟钝？

为什么今天许多美国人依然忽视或低估南北朝朝鲜要求统一这种强烈的思想感情？

本书强调的两个主要因素有助于说明美国至今还不能现实地对待亚洲民族主义力量的原因之所在。

美国未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乃在于亚洲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与美国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根本不同。本书原版第一章所讨论的亚洲国家民族和部族的特性，一般符合按地区划分种族和文化的特性。相比之下，美国社会是一个由具有各种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个人所组成的混合体；组成美国联邦制的州，相当于省，也是按历史事件而不是按照种族或文化标准划分的。美国民族的特性是以大家共同具有的平等主义政治理想为基础，直接与把美国看成是一个“熔炉”的概念相联系。由于在其政治气质中缺少以文化为中心的特性，因而许多美国人不能认识或理解亚洲为寻求以文化和种族为基础的政治特性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感情。在国家领土统一问题上（如令人注目的台湾问题），以及在民族独立运动打破人为的、多民族政治实体（如孟加拉）的问题上，这种横跨太平洋的在知识和心理方面的鸿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政治特性的社会基础不同以外，美国与亚洲民族主义不能达成妥协的第二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于全球地理政治学的概念过分简单化地以我为中心。在美国对世界的独特看法中，美-苏抗衡是压倒一切的因素，并以为反映美-苏抗衡的目前这种国际权力结构将会持久不变。正如第三章（节译本为第一章——译注）所详尽阐述的，大多数美国人对1949年中国革命的民族主义内容一无所知。他们认识不到，人民共和国是作为中国民族特性的公认的保护者出现的，是孙中山要建立一个现代化中国并使它列入强国之林的这一使命的合法继承者，因此，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最初仅把中国看作是苏联势力的延伸。由于同样的原因，当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以后，许多美国人盲目地认为，在美国与苏联的全球斗争中，北京事实上会成为美国的代理人。这一设想充分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之中，尽管它口头上僭称两国主权是平等的。

是的，促使卡特政府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有着种种的考虑。对总统的某些顾问来说，如国务卿赛勒斯·万斯、白宫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他们认为即使北京和华盛顿在苏联问题上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中美友谊本身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可是，正如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回忆录中坦率说到的，决定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是美国想同中国结成一个反苏联盟，同时期望北京在这一联盟中起一个小伙伴的作用。不过在卡特时期，美国的发言人小心翼翼地以强调中美主权平等的词句明确解释了美国的政策。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处理也反映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敏感的，把它看做是中国主权的象征。在里根时期，这种敏感一直在明显地消失。政府发言人常常暗示美国可以无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愿望，因为中国在对付苏联时要依靠美国的支持。美国对待中国的这种想当然的态度更加剧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紧张气氛，而台湾问题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

严重的。

自从本书1978年首次出版以来，亚洲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随后两国在经济和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尽管台湾问题仍存在着内在的危险，但同关系正常化以前相比，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具有爆炸性。另一个重要发展是日美关系的恶化，原因是两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不断加剧，以及美国人天真地作出了更大的努力（见第八章，节译本为第二章——译注）想迫使日本更多地“共同承担”防务支出。为了维持一种良好的政治气氛以便打入美国市场，东京在“共同承担”这个问题上表面上不时地向华盛顿作出一些美好姿态。但是，日本正在明显地采取一种更加独立的对外政策，并且从长远观点来看，它利用同美国军事联盟期间所得到的美国技术，正在建立更加自主的防务能力。日本这种趋向独立的姿态可能会使中日关系稳步地改善（见第十二章，节译本为第六章——译注），但对于美国的利益不一定会构成威胁，如果美国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趋势的话。

自从1978年以来，由于美国恢复了对巴基斯坦已经停止十多年的大规模的军援，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也恶化了。正如第八章（节译本为第二章——译注）所述，印度认为，美国对伊斯兰堡的军援阻碍了南亚“自然”均势的发展，按照这一发展，印度在这个地区本来可以无异议地取得统治地位。新德里为了回报杜勒斯时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拥抱，它转而向莫斯科要求提供从美国得不到的尖端重武器。目前印度正试图从多种渠道获得军备。新德里方面愿意加强同华盛顿的联系，但美国在军事方面继续对巴基斯坦承担义务，正在一步步地破坏印度对美国的友好表示。

苏联在亚洲军事力量令人不安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亚洲对美国的幻觉。例如，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加强了印度不想将来在军事上依赖莫斯科的愿望；苏联在金兰湾建立海军设施

反映出它的海军活动有了加强，这理所当然地使东亚和南亚许多国家感到惶惶不安。面对苏联的军事存在，亚洲国家也欢迎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有效地保持它的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公众舆论欢迎超级大国在亚洲的对抗日益扩大。相反，尽管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但普遍和共同的愿望都是想尽力减少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只要这种减少在性质上是对称的。这种愿望反映在支持地区性的军备限制协定以及为实现政治和解所做的努力，诸如联合国所倡议的就阿富汗问题举行谈判。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美国政策如果不是单纯地反苏而是敏锐地注意到亚洲国家民族主义的力量，将有助于美国更有效地对抗苏联影响的目标。因此，美国在印度、越南和北朝鲜问题上，仅仅注视着苏联目前影响的大小，而忽视了民族主义这一基本力量，这是目光短浅的。华盛顿不执行对这些国家鼓励其民族主义情绪和削弱苏联影响的政策，时间一长，它就往往上了苏联的当。

在中国问题上，正如上面已经说到过的，美国过分强调苏联因素因而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反应迟钝。的确，美国和中国在苏联问题上部分利益是一致的。中国恰如其分地非常重视维持某种稳定的苏美核均势，而美国为了威慑制约苏联的冒险主义则试图同北京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健康的中美关系有助于提醒莫斯科，使它相信，一旦苏美发生冲突，北京和华盛顿有可能结成军事同盟。中美经济合作还有助于北京的现代化，因而也能加强它的军事力量。

可是，为战时假想的军事合作奠定基础，这是一回事；而过早地对苏美关系的前景作出判断并一头扎进先发制人的中美军事同盟，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美国不应该把它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或甚至主要建筑在对付苏联的共同利害关系上，因为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发生变化。北京以其自身的抱负将迅速成为亚洲和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展望未来，良好的中美关系应反映出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概念是敏感的，这对美国来说已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依靠自己注定会成为超级大国，注定会成为越来越有生气的东亚经济、政治共同体的中心点。

第一章

民族主义和毛主义

在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掌权的原因时，十多年来，学者们基本上受到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对连绵不休的内战前景的看法，另一个是与之相关联的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功过的争论。在最早评价共产党人胜利的原因时，大都缺乏远见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对手上面，而未充分考虑双方进行斗争时的特殊战争环境。对国共之争问题，我们主要注意了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它们的弱点，比如注意了这样一些因素：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人支持农村的不满，特别是有纪律的信仰毛主义的干部和搞派系斗争的国民党人之间的区别。过去几乎没有人强调这个事实，即在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年内战高潮来到之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八年的战争期间曾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人们把日本的侵略仅看成是国共之争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他们谋求自己权利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即使有些观察家强调了战争，他们也大多从战争破坏了经济和行政结构这个狭隘的角度看问题，以此说明为什么国民党未能进行经济改革，为什么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突然胜利地巩固了华北“根据地”。

由于对历史进行了较长期的观察，也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已能更加明显地看到，日本的侵略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且在决定特定阶段国共之争的主要性质时，它是一个重要的、有深远影响的因素。当然，各种军事、经济和政治因素的总和导致了共产党的最后胜利。然而，只有加上民族主义这个重

要因素，共产党的方案才得以奏效。从一九三一年满洲事变开始的日本不断的挑战，在中国舞台上投下了阴影，使国内的斗争首先成了对中国民族主义领导权的争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早就抓住了抗日这面旗帜，并在整个战争年代里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迫使蒋介石跟着他建立了统一战线。同时，在民族主义领导威信方面，共产党人发出的号召比国民党人更为有效。由于中国有着非常强烈而历史深远的民族统一的思想，它一直自鸣得意地坚持以我为中心的“文化主义”，而很难接受这样一种意见，即它不过是面临列强的争夺而必须动员自己潜力的许多国家之一。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才首次唤起了民众的民族主义觉悟；也只有共产党对日本的挑战作出了最有效的回答。

抗 日 旗 帜

一九三一年以前，国民党实际上垄断了民族主义，因为无论如何，蒋介石的掌权主要是依靠有战斗性的“反帝”号召。他曾迫使列强减少了它们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并使中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外交地位。二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反对西方的。国民党继承孙中山的衣钵，成了民族主义的捍卫者。可是满洲事件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蒋介石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国军事挑战，策略上进退维谷。

如果他不抵抗日本，就要冒丧失民族主义领导权而把它让给共产党的风险。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某些要人一再提出了一些强有力的论据，主张同日本和解。有些人说，中国的唯一希望就是赢得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时间，以装备不好的劣势兵力进行无益的抵抗，等于是自杀。还有些人以泛亚团结为名公开鼓吹与日本和解，认为在付出了可以容忍的代价以后就能安抚日本，这样

东京和重庆就可摆脱西方影响而携手合作。还有人强调了中国国内的发展任务，并警告说，战争会使中国倒退一代人的时间。蒋介石本人的主张是，在转过来对付日本之前，决心首先消灭共产党和军阀。这就是为什么他终于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

由于日本很快控制了满洲，并稳步地渗入到内蒙以及华北的大片地区，有教养的中国人日益不愿支持国民党。当时在中国的一位美国记者曾看到，由于蒋介石没有抵抗日本的入侵，“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觉醒了。当一九三二年四月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后，他们深受鼓舞。^①起初，学生们的义愤压抑在心里，但是，当日本继续想搞华北“自治”时，他们的爱国热忱终于迸发出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带动全国起来抗议蒋介石的政策。一二·九运动，最初是由当地分散的学生团体自发组织、自行蔓延、配合甚差的连锁反应。正如约翰·伊斯雷尔所指出的，后来“共产党的工匠们把不成熟的民主主义变成了有目的的政治力量”。^②

三十年代中期当国民党利用共产党渗透这一罪名为其严厉的镇压措施进行辩解时，对当时共产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学运，有过很大的争议。即使一九三六年初的学生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共产党的控制，那也不能怀疑从性质上说它是有着深远根基的学生情感的一种真实表现。对这一时期进行仔细研究以后，^③就可看出真实的情况是：并非善于笼络人的共产党人操纵和影响了温顺的学生，而是强有力的学生运动浪潮促使中国共产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共产党领导人集中注意了学生运动的组织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全国分散的学生运动，反过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也大批涌进了共产党队伍，在该党发展的关键时刻向它输送了一批主要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年轻而有生气的新领袖。学生运动的高涨不仅影响到共

产党内部的发展过程，而且对国共两党的关系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二·九学生运动，以及同时展开的救亡运动，都是对国家遭受外侮而国内还在自相残杀的情况作出的回答，这两个运动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对于从统一战线中能得到最大好处的共产党来说，这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使国民党处于守势的难得机会。由于学生抗议而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共产党更加能够在民族事业中把一个不合作的伙伴的角色派到国民党头上。

在整个战争中，国共双方一面忙于抗日，一面想方设法在日益发展的内战中争夺地盘。蒋介石渴望把共军牢牢地拴在华北，从而防止它利用战乱的机会在长江流域建立据点。共产党考虑到即将来临的战后之争，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与蒋介石对抗的地位，同时也对统一战线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证明，他们对统一战线心理上的重要性比蒋介石更加敏感，比一味反共的蒋介石更能争取到无党派人士的信任。

查默斯·约翰逊评述道：“政府在法律上有权谴责共产党的活动，攻击它的军队或报纸；然而，这样作就会损害自己在群众中的声誉，因为群众在政治上最关心的是‘救亡’和‘抗日’。共产党人知道只要他们比政府表现得更加抗日，他们就可以违反国民党的军令而不会受到指责。”^④日本人的宣传中特别恶毒地攻击共产党，把他们当作日本最大的敌人，这无意中就支持了共产党代表民族正统地位的说法。由日本扶植起来的南京傀儡政权不断向重庆方面发出呼吁，希望团结起来共同反共。蒋介石被含蓄地描述为上了共产党的当，因为他不是真想抗日，他同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仅仅是出于政治投机，而不是真有爱国心。

关于“农民民族主义”的争论

一九四五年以前，共产党之所以赢得了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支

持，关键是它所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在分析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时，现在大都认识到了这一关键因素的重要性。可是，往往有人倾向于把学生的民族主义看成是仅仅局限于中心城市的孤立自发的现象，而更多强调经济上的不满则是农民支持共产党的主要原因。在共产党势力上升时期，大多数实地观察家首次提出了一个论点，即民族主义是一个跨越了城乡界线的因素。这个论点最早由查默斯·约翰逊提出，现在已为广大学者所接受。约翰逊在日军档案中的发现以及经专家们讨论以后，已无可怀疑地表明，至少在华北，共产党是通过动员有广泛基础的抗日民族运动才巩固了它对农村的控制。在那里，也象在其它地区一样，革命的经济上的追求是共产主义远景一个能激起人们兴趣的中心部分。但是，战争为多阶段的战略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革命目标应适应民族危机的要求有选择地加以实现。特定阶段的要求被成功地融合到民族主义的总要求之中，这就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一个坚固的跳板，使他们取得了最后胜利。

概括起来说，约翰逊的分析表明，由于共产党抗战期间统一战线战略有意识地缓和了阶级斗争，因而能够消除农村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游击战争期间，在华北农村逐步扩大了他们控制的地区。江西苏维埃政权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的军事运动未能修改激进的土改目标以争取富裕农民和中农与其合作。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仅在他们控制下的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尽管共产党降低了革命的经济要求，在战争年代，他们在华北团结的群众人数达到了最高峰，其原因在于日本过于贪婪。这就唤起了当时尚处于休眠状态的农民阶级的潜在的民族意识。

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中国，许多领导集团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它们所活动的社会环境并不是民族主义的”。^⑤后来战争改变了这一状况，特别是在直接受到了日本破坏的华

北，这时，只有共产党订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用以填补因日本侵略而造成领导和行政管理方面的真空。他们也具有组织能力和纪律性，而且接受了以往所犯错误的教训，并通过磨炼，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纪律性有了进一步加强。山西省是由军阀阎锡山控制的，国民党在那里从未占主要统治地位，这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比较方便的场所。约翰逊回顾了一九三七年以后共产党在山西、陕西、河北和山东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情况，说明了顽抗的农民和受到挫败的日本进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日本遇到的抵抗越大，他们的行动就越野蛮、越恐怖，但这又激起了更加坚决的抵抗。在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二年游击战争期间，共产党军队的人数增加了十倍。约翰逊指出，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推行的“焦土政策”，为加强农民的抵抗和完全打乱农村老的管理结构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填补真空后，共产党人证明自己在抗日方面是更有能力的组织者，他们系统地执行了一套预计能赢得某些有影响的集团信任的良好的农村管理计划。日本人把国民党从广大地区赶了出去，为共产党打开了道路，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共产党没有连贯的战略和有效的组织能力来利用这一机会，那么，仅仅这个事实也没有多大意义。

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考虑到整个作战时期以及整个兵力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承受的抗战任务和共产党承受的抗战任务一样多，或者还要更多一些。但共产党絮絮不休的统战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却淹没了这一事实的心理影响。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在华北，中央政府的部队打了一仗之后，很少能在一个地区呆下来，而共产党在当地长期领导了农民斗争，建立了适应新型游击战争的新的地方政权机构，因而他们能长期控制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日战争。由于共产党人和农民同生死，共患难，因而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为一九四九年新的共产党政权奠定了合法的权力基础。